

绪 论

《中国传统文化简明教程》，是遵照国家教委关于在理工科大学学生中开设传统文化教育课程而编就的一部教材。在各章开展之前，先将有关问题作一说明。

一、“文化”的涵义

“文”的本义，指各色交错的纹理。如“物相杂，故曰文。”（《易·系辞下》）“五色成文而不乱。”（《礼记·乐记》）“文，错画也，象交文。”（《说文解字》）均指此义。由此“文”又引申出若干层涵义，如包括语言文字在内的各种象征符号，进而具体化为文物典籍、礼乐制度；由伦理之说导出彩画、装饰、人为修养；在此意义之上，更导出美、善、德行之义。

“化”，本义为改易、生成、造化。如“化而为鸟，其名曰鹏”（《庄子·逍遥游》）“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易·系辞下》）“赞天地之化育”（《礼记·中庸》）等等。概言之，“化”指事物形态或性质的改变；同时“化”又引申为教行迁善之义。

“文”与“化”并联使用，最早见诸于战国末年的《易·贲卦

·象传》：“(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上，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话是说，治国者须观察天文，以明了时序之变化；又须观察人文，使天下之人均能遵从文明礼仪，行为止其所当止。在这里的“人文”与“化成天下”紧密联系，“以文教化”的思想已十分明显。

西汉以后，“文”与“化”方合成一个词。如“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汉·刘向《说苑·指武》）；“文化内辑，武功外悠”（晋·束皙《补亡诗》），这里的“文化”或相对于自然现象，或相对于没有经过教化的“质朴”、“野蛮”。

西方各民族语文系统中，亦多有与中国“文化”对应的词汇，不过它们相互之间还略有差别。

拉丁文 *Cultura*，原形为动词，含有耕种、居住、练习、注意等多重意义。与拉丁语同属印欧语系的英文、法文，也用 *Culture* 来表示栽培、种植之意，并由此引伸为对人的性情的陶冶，品德的教养，这就与中国古代“文化”一词的“文治教化”内涵比较接近。所不同的是，中国的“文化”开始就专注于精神领域，而 *Culture* 都是从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生发，继而引申到精神活动领域的。可见，*Culture* 的内蕴比“文化”更为宽泛，而与中国语言系统中的另一词汇“文明”更加切近。“文明”从词源学上追溯，正如唐人孔颖达疏解《尚书·舜典》“睿智文明”时所说：“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换言之，“文明”是从人类的物质创造（尤其是对火的利用），扩展到精神的光明普照大地。简言之，“文明”兼容物质创造和精神创造双重意义，接近于今天人们通常理解的广义文化。中国与埃及、巴比伦、印度共称四大“文明古国”，而不称“文化古国”，原因就在这里。

由上述可见，文化作为人类社会的现实存在，具有与人类本

身同样古老的历史。文化在时间上的演变和空间上的差异，引起思想家们的浓厚兴趣。而对于“文化”的内涵进行广泛的探究，是近世以来从欧洲人开始的。

近代以来，社会生产力突飞猛进的发展，带来了研究手段和条件的较大改善，尤其是社会进步大趋势对于精神养料的迫切需求，更促成了专业化的文化研究的长足发展，并已基本形成如下共识：

——人类从“茹毛饮血，茫然于人道”（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十）演化而来，逐渐形成与“天道”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人道”，这便是“文化”的创造过程。

——在文化的创造与发展过程中，主体是人，客观是自然，而文化便是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在实践中的对立统一物。

——文化的出发点，是从事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活动，进而改造自身即实践着的人。人创造了文化，同样文化也创造了人。

——文化的实质性含义，是“人化”或“人类化”是人类主体通过社会实践活动，适应、利用、改造自然界客体，而逐步实现自身价值观念的过程。

——文化的成果体现，既反映在自然面貌、形态、性质、功能的不断改观和进步，更反映在人类个体与群体素质（生理与心理的、工艺与道德的、自律与律人的）的不断提高和完善。

综上所述，“文化”的涵义可概括为：凡是超过本能的、人类有意识地作用于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活动及其结果，都属于文化；或者说“自然的人化”，即文化。

二、广义文化与狭义文化

长期以来，人们在使用“文化”这一概念时，视其内涵、外延的差异，又把它分为广义文化与狭义文化。

广义的“文化”着眼于人类与一般动物、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本质区别，着眼于人类独立于自然的特殊生存方式，其涵盖面非常广泛，所以被称作“大文化”。面对涵盖非常广泛的认识对象，人们自然要将文化的结构解剖，当作文化研究的首要工作。

关于文化的结构，有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两分说，物质、制度、精神三层次说，物质、制度、风俗习惯、思想与价值四层次说，物质、社会关系、精神、艺术、语言符号、风俗习惯六大子系统说，等等，我们在这里以四层次说展开论述。

（一）物态文化层，是由人类加工自然创制的各种器物，即“物化的知识力量”构成的。它是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及其产品的总和，构成整个文化创造的基础。物态文化以满足人类最基本的生存需要——衣、食、住、行为目标，直接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反映人类对自然界认识、把握、利用、改造的深入程度，反映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二）制度文化层，是由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建立的各种社会规范构成的。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是一种社会的活动，只有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才能进行。人类高于动物的一个根本之处，就是他们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又创造了属于他们自己、服务于他们自己的社会环境，创造了一系列的处理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准则，并将它们规范化为若干社会制度，如经济制度、婚姻制度、家族制度、政治法律制度等等。制度文化成果虽然不直接与自然界

发生关系，但它们的特质、发育水平，归根结底是由人与自然进行物质交换的一定方式所决定的。

（三）行为文化层，是由人类在社会实践，尤其是在人际交往中约定俗成的习惯性定势构成的。它以民风民俗形态出现，见之于日常起居动作之中，具有鲜明的民族、地域特色的行为模式。民族的、时代的文化，既有物质的标记、制度的规范，又有具体社会行为、风尚习俗的鲜活体现。《礼记·王制篇》说“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汉书·王吉传》载“是以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都是对于人类行为文化的明确指认。以民风、民俗形态出现的行为文化，有三个特征，首先，它的产生是社会的、集体的，不是个人有意无意的创作；其次，它的存在不是个别现象，而是集体性的、类型的或模式的；再次，它们在时间上是传承的，空间上是传播的。

（四）心态文化层，是由人类社会实践和意识活动中长期积淀化育出来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构成的。这是文化的核心部分。心态文化又可分为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态两个子层次。社会心理，是指人们日常的精神状态和思想面貌，是尚未经过理论加工和艺术升华的流行的大众心态，诸如人们的要求、愿望、情绪等。社会心理较直接地受到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的影响和制约，并与行为文化交融互涉，互为表里。社会意识形态，则指经过系统加工的社会意识。它往往是由文化专门家对社会心理进行理论归纳、逻辑整理、艺术完善，并以物化形态——通常是著作、艺术作品——固定下来，播之四海，传于后世。

由上述可见，广义的“文化”，是从人之所以为人的意义上立论，认为正是文化的出现，“将动物的人变为创造的人、组织的人、思想的人、说话的人以及计划的人”（《多维视野中的文化理论》），

因而将人类社会——历史生活的全部内容统统摄入“文化”的定义之中。一般来说，文化哲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工作者多持此类文化观点。

与广义“文化”相对的，是狭义的“文化”。

狭义的“文化”排除人类社会——历史生活中关于物质创造活动及其结果的部分，专注于精神创造活动及其结果，所以又被称作“小文化”。1871年英国文化学家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提出，文化“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这是狭义文化的早期的经典性表述。在汉语言系统中，“文化”的本义是“以文教化”。亦属于“小文化”范畴。

本书肯定“大文化”概念，但基本上是以“小文化”为论述范围，主要讨论涉及精神创造领域的文化现象。换句话说，在本节前面剖析的文化结构四层次中，我们主要围绕第四层次即心态文化层而展开论析。

狭义文化在逻辑上从属于广义文化，与后者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我们在研究人类精神创造时，不能忽略物质创造活动的基础意义和决定作用；在讨论关于心态文化诸问题时，不能忽略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对心态文化的影响、制约，总之，不能将“小文化”与“大文化”割裂开来，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观与方法论的一个基本要求。

三、中国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

民族性、国度性是文化的重要属性之一。在世界历史上，各民族、各国家分别在不同的自然、社会条件提供的舞台上，演出

了性质不同、情节有别、风格各异的文化正剧。本书所论的中国文化，是指由中华民族在东亚大陆广袤的土地上创造的文化。

中国，是我们民族文化的摇篮。作为一个地理概念，其内涵经历了一个渐次扩展的过程。

上古时，华夏族（古汉族自称）建国于黄河流域，自认为居于天下之中央，故称中国，而周边地区称四方。秦汉以后，以汉族为主体的大一统中央政权建立，历朝版图有损益，但基本趋势是不断扩展。清代疆域“东极三姓所属库页岛，西极新疆疏勒，至于葱岭，北极外兴安岭，南极广东琼州之崖山”（《清史稿·地理志》），包括今天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的部分领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相继与缅甸、尼泊尔、蒙古、巴基斯坦、阿富汗等邻国签订边界条约，至此，形状酷似雄鸡的中国疆域最终定位。本书所论中国文化，在地域上，以此为界。

中国文化的创造主体，是中华民族。

中华民族，是现今中国境内由华夏族繁衍而来的汉族及 55 个少数民族的总称。中华之得名，由来已久。“中”，意谓四方之中。“华”，本义为光辉、文采、精粹，用于族名，蕴含文化发达之意。元人王元亮说：

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仪，故谓之中华。（《唐律疏文释文》）

在漫长的历史年代里，随着疆域的扩大，社会的发展，中国境内各族间的联系纽带愈益强化，民族共同体诸要素——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的共同心理素质——渐趋完备。进入近代，由于西方资本主义殖民势力的侵入，中国境内各族更增进了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整体意识，进一步形成了自觉的民族观念，“中华民族”遂成为包括中国境内诸民族

及散居在世界各地的炎黄子孙的共同称谓。在全世界范围内，“凡遇他族而立刻有‘我是中国人’之一观念浮于其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一员也”（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第 11 册）

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对于人类的伟大贡献。独具特色的语言文字，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嘉惠世界的科技工艺，精彩纷呈的文学艺术，充满智慧的哲学宗教，完备深刻的道德伦理，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基本内容。

文化是一个生生不息的运动过程。任何一个民族文化，都有它发生、发展的历史，都有它的昨天、今天和明天。本书所论，重点在中国文化的“昨天”，具体而言，是以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文化，即通常所说的中国传统文化为主要对象。全书的第一至十一章，均围绕中国传统文化展开讨论，仅以全书的最后一章论及中国文化近、现代发展问题。

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的先辈传承下来的丰厚遗产，曾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传统文化是历史的结晶，但它并不只是博物馆里的陈列品，而是活着的生命。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代代相传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一方面具有强烈的历史性、遗传性，另一方面又具有鲜活的现实性、变异性，它无时无刻不在影响、制约着今天的中国人，为我们开创新文化提供历史的依据和现实的基础。因此，传统文化距离我们并不遥远，在现实生活的强劲脉搏里，时时刻刻都能感觉到它的存在。传统文化在影响现实的同时，也在新的时代氛围中发生蜕变，加进新的文化内容。

四、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目的、意义和方法

本书旨在给高等工科院校大学生提供一个了解祖国悠久历史、丰厚文化遗产的简明读本。使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基本精神及发展趋势有所认识和把握，并对中国文化的继承和创新问题，引发思考、探索。

学习、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有助于更加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我们民族精神

开放的中国，八面来风，驱散了曾一度笼罩在我们民族心里的封闭阴云。开放的世界，使人类各民族的文化相互交流正在向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地球村”越来越“小”。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中华民族及其文化以怎样的姿态参与“地球村”的合作与竞争，是每一个炎黄子孙都应该思考的问题。真切地把握一个民族的文化特征和基本精神，较之把握诸如皮肤、头发、眼睛的颜色之类体质特征，要困难得多。然而，任何民族，其文化形态尽管纷繁多彩，但都可以寻觅到该民族文化的主色调、主旋律。唯其如此，才有英国人绅士风度说，德国人精确高效率说，美国人自由开放说，日本人善采异邦说，等等。在芸芸众生中，我们之所以能够大致辨识各民族的特征，是因为每一个民族内部，虽然存在着繁复多样的阶级、阶层、集团、党派及个人教养和性格的区别，但同时也深藏着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便是所谓民族精神。学习、研究中国文化，正是我们认识自己，把握中华民族精神的可靠途径。

（二）有助于更加全面了解和深刻认识我们当前的国情

跨世纪一代中国人面临的历史使命，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完成这一千秋伟业的认识前提，是切实认清中国的国情。国情的实质，是民族文化的历史及其现状。40多年来，中国走过了艰难曲折的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我们的社会发展及文明进步程度，还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的要求。数千年传统文化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遗产，同时也带来因袭的重负。外来资本主义文化的积极因素，我们吸收得很不充分，但其负面影响已引起我们的警惕和忧虑。深入地剖析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对今日中国的影响，总结40多年来我们走过的道路，是认清国情的必要工作。

（三）有助于以科学态度和务实精神去继承传统，创造中华民族更加美好的未来

马克思说：“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自己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09页）中国文化，就是我们“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是影响中国人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传统。文化传统，是社会的一种生存机制和创造机制。借助于它，历史才得以延续、进行、飞跃，社会的精神成就和物质成就才得以保存和实现。正因为如此，文化传统并非仅仅滞留于博物馆的陈列品和图书馆的线装书之间，它还活跃在今人和未来人的实践当中，并在这种实践中不断改造自己。每一个有志于为振兴民族的未来贡献心智和汗水的中国人，都应努力熟悉传统、分析传统、变革传统，而学习、研究中国文化，正是培育这种科学态度和务实精神的最好课堂。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面对这样的学习、研究对象，掌握正确的方法，十分重要。

（一）勤学苦研与社会考察相结合，是最基本的学习方法

中国传统文化的要义，大多记载在历史遗留下来的大量典籍之中，也存在于社会生活中，以非文本的形式广为流传。因此，面对如此丰厚的文化遗产，必须勤学苦研。在认真学习课本知识的同时，还应适当选学一些经典文献，如《诗经》、《论语》、《史记》等，从中把握中国文化的精髓。而且将课堂学习、经典研习与社会考察结合起来，相互印证，相互补充，从而对生生不息的中国文化，有一个动态的、全面的了解。

（二）历史的研究，科学的评析，是学习和对待传统文化的基本要求

中国传统文化经过数千年演化，内容异常丰富多彩。我们要对它的来龙去脉有一个明晰的了解，把握它的主要特征和基本精神，就必须掌握正确的历史研究方法，进行科学的评析。所谓历史的研究，就是任何一种文化现象的产生、兴盛、衰落、蜕变，都要放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去考察、认识；而且用两分法进行科学的评析，既要看到它产生、勃兴的历史必然性、积极作用的一面，又要看到它衰落、蜕变的客观必然性、消极作用的一面。苛求古人，否定过去，非历史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都是有害的。但兼收并蓄，肯定一切，脱离实际，一味地沿袭前说的复古主义，也会窒息科学的生命。唯有根据新时代的新要求，批判地继承前贤已经取得的成就，同时又开拓创新，才能为创建社会主义的新文化作出贡献。

（三）学以致用，立志成才，是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最终目的

科学竞争，人才竞争是下世纪竞争的核心。这种人才，应是全面发展的综合素质高的人才；而其中人文素质占据着特殊重要的地位。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灿烂的、代代相传的思维方式、

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对于我们今天的年轻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有着特别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意义。每一个青年大学生，都应该站在立志成才的高度，学习好中国传统文化，在学习与实践中，努力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把自己培养成为更加全面的高素质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第一章 中国文化产生的自然社会条件

文化是在特定的空间发展起来的一个历史范畴。世界上没有超时空的文化。不同民族因不同生活环境而逐渐形成风格各异的生产、生活方式，并滋养孕育了各种类型的文化；同一民族又因生活环境的变迁和文化自身的运动规律，其文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又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即所谓“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心雕龙·时序》）前者是文化的地域性（民族性），后者为文化的阶段性（时代性）。

中国文化之所以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跌宕起伏，绚丽多姿，是与养育它的（自然）地理环境、社会经济基础和社会政治结构等自然、社会条件分不开的。

第一节 中国文化的历史地理环境

历史地理环境，是指中国进入文明社会以来整个历史时期的地理环境。它包括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又分为经济地理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一般说来，自然地理环境的构成因素有气候、地形地貌、水文、植被、海陆分布等，而人文地理环境的构成因素则有疆域、政区、民族、人口、城市、交通、农业、牧

业等。

一、广阔的文化发展基地

中华大地地处全球最大陆地——亚洲大陆东部和全球最大海洋——太平洋西岸。其地理条件具有一个明显的特征：疆域辽阔，腹里纵深，回旋天地开阔，地形、地貌、气候条件繁复多样，形成一种恢宏的地理环境。这是其他多数古老文明的发祥地难以比拟的。中国文化因而拥有一个较之其他古文化更为广阔的发展基地。

中国文化最重要的发祥地是被惯称为中华民族、中国文化摇篮的黄河流域。这片七八十万平方公里的黄土高原和冲击平原，在古代曾是林茂草肥，自然生态环境良好的地域，华夏先民在这里牧猎进而发展农耕地，奠定了文明的根基。对云南元谋、陕西蓝田、北京周口店等猿人化石的考古发现，中华民族的祖先早在一百多万年至几十万年前，已栖息于东亚大陆的广大区间，长江乃至辽河流域，以及西南崇山峻岭间，也有长达四、五千年的文明史，同样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这些区域的总面积，有五百万平方公里左右。

自殷商时代起，中国进入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此后，中华先民活动地域愈益扩展。商人最早居住在山东半岛，前十四世纪，盘庚迁殷，其居住中心移至黄河中游。周人崛起于陕甘高原，又在泾渭平原得到发展，并不断向东扩充，成为雄视中原的王族。楚人在长江流域发展了楚文化，使中国文化的范围进一步扩展。自春秋至战国大体形成三晋、齐、燕、秦、楚、越六大文化区，地理范围大约包括秦长城以南，黄河上下，长江南北。《尚书·禹贡》把当时的版图划为九州，《吕氏春秋》更对九州有确切划分：河汉之间为豫州，周也；两河之间为冀州，晋也；河济之间为兖

州，卫也；东方为青州，齐也；泗上为徐州，鲁也；东南为扬州，越也；南方为荆州，楚也；西方为雍州，秦也；北方为幽州，燕也。这“九州”便是自上古以来中华先民着力开发的地段，在同期文明古国中，领域辽阔，无与伦比。

秦汉以后，以上各区域文化融合而为汉文化，先民继续开疆拓土，实行民族交汇，形成地广人多的大帝国，又经唐、宋、元、明、清历代发展，终于奠定了今日中国近一千万平方公里的广大领域，为中华民族及中国文化的滋生繁衍提供了广阔的天地。

二、完备的气候类型，繁复的地形、地貌和流域

中国地势西高东低，山地、高原和丘陵约占三分之二，盆地和平原约占三分之一。山脉多东西走向，河流也因此多东西走向，自西向东构成了落差明显的阶梯（习惯上称“三大阶梯”）。

中国领土大部处于中纬度，北温带，气候温和。黑格尔说：“历史的真正的舞台所以便是温带，当然是北温带，因为地球在那儿形成了一个大陆，正如希腊人所说，有着一个广阔的胸膛。”（《历史哲学》第 124 页）中国气候有三个明显特征：一是季风气候明显，二是大陆型气候明显，三是气候类型多种多样。完备的气候类型为农业经济的多样性发展提供了基础。秦岭淮河以北成为以小麦、粟米为主要作物的旱地农业区，以南成为以稻米为主要作物的水田农业区。又由于降雨量的大势是东部充沛而西部稀少，这便使东部成为农耕区，西部成为畜牧区。“自然之富，物产之丰”的地理环境，是滋养、孕育中华文明的先决条件。

三、复杂的地理环境是中国文化多样化发展的空间条件

作为幅员辽阔的泱泱大国，中国各地自然条件千差万别，经济、政治水平也参差不齐，因此，各地的文化发展也极不平衡，丰富多样，异彩纷呈。

早在晚周时代，环境的多样性，导致文化的丰富多元状态已经形成，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便是明证。东临沧海、山海兼备的齐鲁文化大相歧异于处在“四塞之地”的秦文化，南方的楚文化不同于地居中原的三晋文化，同在长江流域却又因上中下游地形地势之变化而有各具特色的巴蜀文化、楚文化与吴越文化。至于在干燥的西部发展起来的游牧文化与在湿润的东部发展起来的农耕文化更是大相径庭。

不同的地理环境与物质条件，使人们形成了不同的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衣食住行之不同而导致风俗习惯之差异，以及由此生发出来的经济、政治等因素，对学术文化的发展、学派的形成都产生出深刻而久远的客观影响，常常因地域而分野明显。这种由地区多样性导致的文化多元倾向，与文化“大一统”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中国这个东方大国文化的显著特点。即所谓“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易·系辞下》）

第二节 中国文化根植的经济基础

东亚大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地理生态环境，滋养、孕育了华夏民族以农耕经济为主体的经济生产形态。

一、农耕自然经济是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的主体

考古学发现，中国农耕文明早在四五千年前就已肇始。兴起于气候适宜、土壤肥沃的黄河中游的新石器时代的农耕共同体——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已基本实现了从渔猎向农耕的过渡。时代相当的钱塘江流域的河姆渡文化和长江中下游的屈家岭文化也显示出中国先民辛勤耕耘、繁衍生息的时代痕迹。中国古代历史典籍中关于传说时代即有“以农立国”的记载，《尚书》有对统治

者当“先知稼穡之艰难”（《书·无逸》）的劝诫，《论语·宪问》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农耕是财富的来源。《易·无妄》中“《象》曰：不耕获，未富也”。

战国以后历朝历代统治者，都极为“尚农”，并以此为本，“重农抑商”；“务本”以“安邦”；“重本”抑末”成为“理国之道”，农业繁荣成为富国强兵的基础，国固邦宁的根柢。管子《山权数》说“孝弟力田”者是社会中坚，农民是社会上层建筑赖以立足的基础，文化生长发育的根本。因此，中国文化的荣光和恒久，局限和弱点，都与经济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农业，人口中居大多数的农民，有着难分难解的关系。

中国农业文明发端于土质细腻疏松的黄河中下游，并使之成为上古时代的政治、经济和人文中心。随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铁制农具和牛耕的普及，以及在汉魏以后的数百年战乱压迫下中原农耕男女的向南迁徙，中国南方优良的自然气候条件和生态环境，很快就显示出发展农耕经济的巨大潜力。于是，中国农耕区的中心逐渐南移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及江南地区。隋唐以后，长江中下游成为长安、洛阳、开封、北京等京师漕米、布帛的主要供应地，“湖广熟，天下足”、“苏杭熟，天下足”等谚语反映了经济重心南移的事实。南北运河的开掘，为的是以新兴的东南农业经济支撑北方的军事政治中心。“东南财赋”与“西北甲兵”共同构成唐、宋、元、明、清历史社会政治稳定的两大支柱。

自唐代以后，中国农耕区不断扩大，从黄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渐次发展到长江上游，东南沿海和西南高原。

就在黄河流域以南农耕文明日益发展的时候，中国西北地区，正繁衍生存着剽悍善战的游牧民族。他们世代“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史记·匈奴传》）。草枯水乏之际他们常因